

國語大師何容 (下)

● 趙廣賜

語言學與國語大賽

民國六十年，彰化省立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，改為彰化教育學院，許院長智偉來舍託我籌畫語文教育學系。當與何容、許世瑛、吳匡（師大英語系教授兼語文中心主任）、吳延環、張希文等會商，並向葉公超先生、（函）趙元任、李方桂、楊聯陞……諸大師請教，決定國語、英語兩組招生；迭經研討，最後由院呈部。何容認為培植國語專業幹部有望，最為熱心。不意教育部俗吏識淺，竟只准英語組招生，國語組緩議。此則我與何容合作未成之另一憾事。

民國六十一年，許院長調升教育廳長，堅邀我與何容併作國語會副主委，均義務職。總幹事由教廳第五科長擔任，重組國語推行委員會，繼聘原國語會委員，共策進行。嗣增設推行小組，加聘張博宇、王天昌、黃雲生為委員，連同原有張廣權、劉秉南二員，每月在台中集議會務。那時許廳長確有衝勁，熱心語文教育兩件事：第一件是認為語文測驗是教學科學化的具體辦法，乃從十年前就幫忙作多場測驗的監試委員會體會到的

，乃連年由廳撥予測驗補助費。卸任廳長後仍熱心測驗，大力策動農民生活調查，代洽省黨部委託測過一萬一千人，提倡農民保險。第二件就是國語推行，幾年內認真主持會務，凡有建議無不採納，諸如補充增加國語推行預算，甄選補齊各縣市國語推行員，改進每年全省國語大賽，協助國語日報國語教育推行工作等事項。又因何容以國語日報董事會中向有教育廳代表。將我作為代表延聘為董事出席常務董事會，多少增加了國語推行的機會與氣氛。

各縣市國語推行員，經甄選補足後，水準稍見提高，因教育廳長表示積極，各員隨之振奮，多員乃有進修之意願。我覺得應引向「語言學」學習。乃建議將推行員九十餘人，分三年調訓，利用暑假在台中辦理，以語言學為重心的講習會，聘請中研院資深研究員楊時逢主講語言學；何容與我亦一同往台中駐會，與學員共同生活，順便講述文法、語法、工具書、語文測驗等；另先後聘請史語所所長屈萬里、丁邦新蒞會作專題講演，以開各員將來隨時請教之門。第三屆講習時，我並倡議全省推行員合編「國語通訊」，以資

互相交換經驗並討論實際問題。款由何容補助，齊鐵恨亦扶病贊助。另外，何容總想建立全省國語音檔，經過我與高雄師範學院聯繫，贊助增設國文研究所，即洽定委託該院設立「音檔」，技術上由何容指導，使其理想得以實現。此乃我與何容合作六年之大概。

重編國語辭典滄桑

民國六十六年教育廳長易人，我認為國語熱潮將退，立即辭去副主委連帶放棄國語日報董事兩義務職；但與何容合作，仍然繼續。比較重要者為修訂國語辭典。

語言為活體之文化媒介，時代與地域不同，自有許多變易衍化。文字雖由秦始皇時期規定書同文，由簡入繁，但古今異體，使用習慣尤多歧異。我國地域遼闊，方言龐雜，與文字之變遷互相影響，更增加語言之複雜性。台灣閩粵語言本與中央系統不同，台灣光復後，海外及大陸各省來台人士所操方言之音、調、語彙及語法，更多差別。推行國語實需統一之標準，汪怡所編：「國語辭典」，乃比較標準且語彙豐富之巨著，但



①何容（左）與錢思亮（右）晤談時留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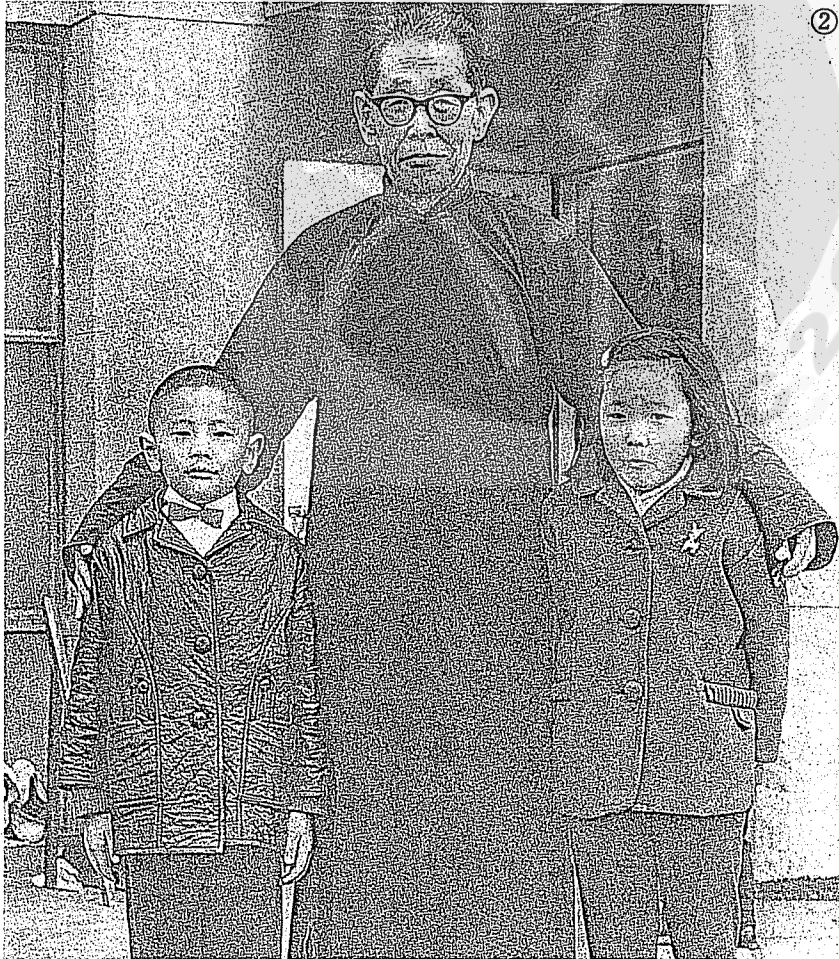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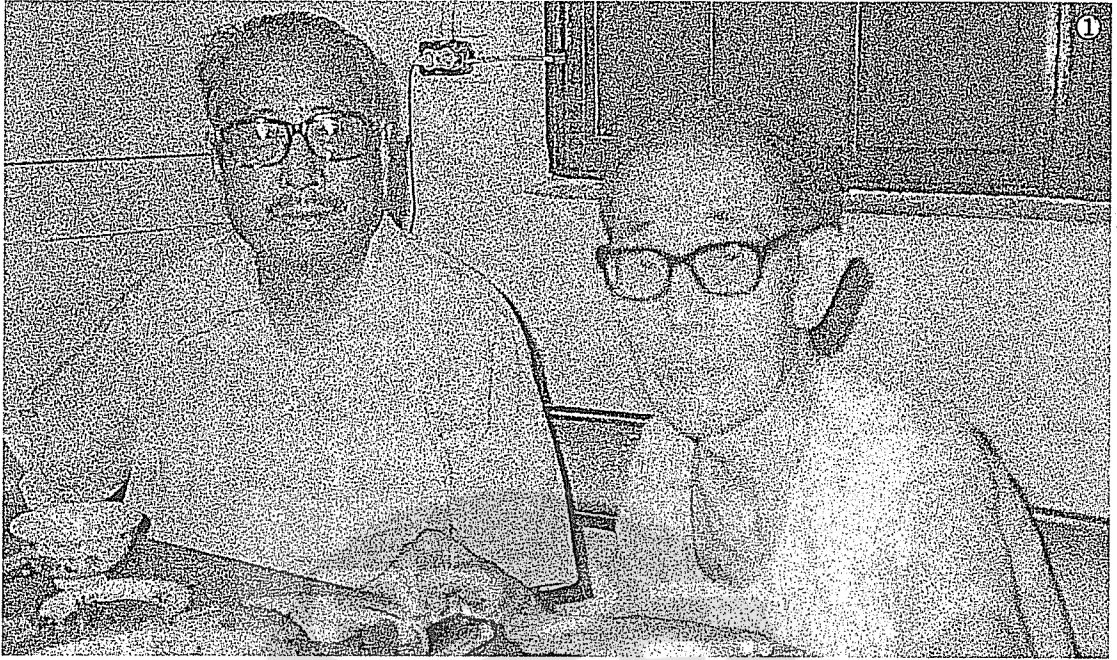
②何容（右）與白滌洲（左）、王向辰（中）合影。



在抗戰期間於淪陷區排印，諸般困窘中，難免若干訛謔；時地推移，習俗流變，吾人早已覺得汪怡生前校政，最值得尊敬，可惜他限於目力及體力，第三次改正未竟而逝世。何容與我認爲如有機會，允宜繼續爲之，以作國語之典範。恰巧六十二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幫辦王華林（曩在貴州其夫婦二人均在我服務機關所轄之訓練團任幹事。卅八年又在教廳經我調至二科辦事）來訪，因該司擬動支國語辭典版稅碰壁，求我找何容轉商前途。緣汪怡在台逝世時，遺命其公子汪煦（字公旭）與何容同理其版權，而實權仍不在何。汪煦主張將版稅直接由商務印書館逕交教育部，作適當之運用。恰巧我與汪煦爲清華前後同學，其同胞汪預又爲我中學同窗，經汪何與我三人商議，最好以版稅即作修訂國語辭典之用，以此爲條件答復教育部，並承攬此項工作。教部同意後，又通過省國語小組，延約熱心人士十餘人，組織「國語辭典修訂委員會」，衆推齊鐵恨爲召集人，我與何容副之，由我領款在銀行開列專戶。另選張博宇、黃雲生、張廣權、劉秉南、王天昌爲修訂幹部（均在台中地區），連同召集人，先集中校訂第三冊一本。凡抄卡片，奔走影印，購置等事務，指定王天昌爲執行秘書，便於招募東海工讀生爲助。自六十二年準備，六十三至六十四年夏，每月開會研討審訂，計改正補充者一千三百餘則，彙集影印，分送教育部、商務印書館及各修訂委員。（王君經手帳目，至今仍在我手邊）

歷次會議中，僉感此事工程浩大，人力及經費有限，欲竟全功，爲寬籌經費，多聘人手，經洽教育部繼續撥版稅不得，雖汪君主張亦未能如願。況我與何容多次研商，尚不以「修訂」爲滿足。蓋彼時推行國語，不只爲教學所需，且須顧及一般社會人士生活溝通之共同需要，諸如菜蔬、食品及作法，農漁工商器材及動作，情緒之表達，禮俗信仰之習慣，各行業特殊之用語，及大陸各省與海外華僑對台澎習慣之語詞，所有歧異，皆宜搜羅編定及詮釋，始克達成全民溝通，團結統一之作用。校訂之外，尚須大事補充。我忽憶保管清華基金之「中華文教基金會」。每年有利息數萬美金，常作文教事業之補助，該會自美遷台，即設於清華辦事處，我先與其執行秘書聯繫後，正式由修訂委會召集人齊、何、趙三人具名申請。董事葉公超，在會內提案。申請目標爲美金三萬元，分三年撥付，另籌台幣財源配合。葉公超當即決定請行政院核定，始可交相關部會及主計處遵辦。爲便捷計，即由葉氏以政務委員簽呈院長（葉口述，由我執筆，其草稿至今猶存我手）申請兩事：一爲修訂國語辭典；二爲統一編印華語華文教材，供外國學人及華僑子弟學華語國文之用（簡述大陸推行簡體字，被鄰邦日、韓、菲、泰、越、棉、馬來及新加坡採用後，仍用繁體字之我國在亞洲孤立而被包圍，世界各國學術界亦受影響之嚴重事實），立蒙蔣院長經國批准，交教育部商承葉政務委員辦理；三年配台台幣預算，則要主計處會辦。我說明葉公超熱心之原因：何容與洪炎秋在北大受教於葉氏，我在清華也受教於他；我編清華通訊請他作發行人十五年，每三個月主持審稿會議并會餐；當中也曾數度筆書葉師口述發表的文章。雖然中基會董事會主席是錢思亮，董事也有我大學同班俞國華等幾位熟人，葉氏因時常關切我與何容的語文工作，對此事特別熱心，一力承擔。聽錢、俞二同學在會後告我，不知何故葉氏在會中曾斥責某列席人；我則聽說董事會中列席人發言不慎。其實因爲葉氏卸任駐美大使後，先總統蔣介石怕他多言，既不許在大學教書（迫台大退聘）又不讓他出國；在經國先生繼任後，只有統編華語教材，他才藉機赴美兩次，與夫人兒女共享家庭之樂，認爲晚年唯一的幸事。此雖非初料所及，也不關辭典之事，但他兩度出國，我和何容二人送行；病重時我二人探病，葉氏都重重的久久地握手，卻沒說出一字，「盡在不言中」了。

葉先生核閱教育部所擬組織之草案時，曾召何容與我一閱，我建議兩點：①「修訂」宜改爲「新編」或「重編」；②委員會似宜另設「編纂處」或「編輯室」，葉氏謂然。何容則提辭典「體例」以仍依原著爲便，主張「重編」，葉公超謂待成立會時討論決定。結果會中決議，「委員會」上加「指導」二字，性質則定爲「重編」，散會後談及編委會人事，葉主張由何容及我負責，且便於向中基會洽撥美金；教育部則擬聘何容爲總編輯，副總編輯另聘師大教授擔任，以便師大師生多人爲助。葉氏不豫，欲辭指委會主委，何容偕我謁葉氏敦勸，我更表示「事已大定，成功不必在我」。事經周折，最後葉氏決定原則：何容作總編輯，師大教授王熙元副之；另以總編輯月薪之半，每月致送與我，且不必到會工作，



①何容(右)與台靜農教授(左)小酌。
②何容(中)與孫兒、孫女合影。

理由是依國際習慣「誰出主意誰拿錢」。我力辭無效。雖不須到會工作，仍提若干意見與何容參考。編輯工作開始不久，何容來告，我一向的主張，會中大部分接受，已延聘各行各類專家參與工作；至何容本人，則一如作「高中國文編輯委員會」主任委員一樣：「我只是帽子，而不是頭。」雖然每日到編委會工作，但性質偏於審閱與校訂已編之資料，所以出版後他的「序」文也簡略說明「重編工作，事前也經過許多周折，最後才由教育部成立編輯委員會來負責進行。而促成重編工作的則是葉公超先生。我雖接受了總編輯的名義，也確實曾到工作室去工作，不過所作的頂多只能是「備顧問」，而實際……乃是副總編王熙元先生……」其言似乎哀而不傷。這件有益國語教育的大事，我奉葉老師之命，接受總編輯半薪廿二個月，打開僵局，完成此事。何容辛苦兩年，聽說他在辭典出版以後，捐資卅萬元給教育部作教育基金。商務印書館當年總編輯曾為修訂事多次洽辯，而新著出版後他改任中基會董事的楊樹人回國後，電話第一句就說：「二老畢竟成功了重編國語辭典的大功德！」因他洞悉從修訂到新編前後十幾年的經過。至於他習慣稱我與何容為「國語二老」乃是帶諷的玩笑話。不過，無論如何我與何容總算達成了修編國語辭典的心願，也是卅多年二人合作的一樁大事。

編輯高中閱讀文選

六十三年教育部舉行國語文教育研討會，我與何容代表省國語會發言，強調國語與國文同樣

重要，而在社教方面卻加倍；呼籲師資訓練重視「語言」，而師範院校國文研究所，宜偏重語文「教學」的研究，曾引起激辯。其間曾通過我們倆的幾個提案，就中一項，為學生自國中至大專近十年之國文教材，選文不過百篇（且未必都細講精讀），建議加強課外閱讀。巧逢開明書店一向多出出版語文書刊，我談及擬編「高中國文閱讀文選」，該書店極有興趣。乃依據何容主編的高中國文讀本，加倍另選優良之古今詩文，配合課本各單元之中心。該書店原在大陸即以編印語文書籍著名，何容及其公子何欣教授、許世瑛教授……等多人為其主要書刊作者。猶憶卅八年治安機關查禁夏丏尊、朱自清著作，我為師範院校教材在教育廳提出證明，函予解禁，因此該店一向十分合作，經約資深教師楊淑潤、黃雲生、蘇法昭、柯劍星、陶佩珍等分別選注詩文。初以高中一年級文選七十餘篇為一冊，三冊共選二百餘篇；後國定高中課本改編，乃隨之每學期各編一冊，先後六年，共編九冊，我與何容一人主編一人校訂，直至七十五年夏季後，何容病甚為止。是我二人最後合作的工作。

民國六十七年，熱心國語運動之立委、國代及大學教授多人，鑒於事實需要，建議教育部恢復以前之「國語推行委員會」何容是應運籌畫的主角，（我則已先一年辭卸省國語會副主委）但他認為時機並未成熟，對此似乎並不熱心。聽說因部中有人主張改設「國文」教育委員會，徵求何容意見，他沒有反對，只推荐委員二人，一為高明，另一人為我。原發起人（我不在內）認為

變更原議主旨，勸何容堅持或拒絕參加，結果仍組成「國文」委員會，我幸未膺聘，故不知究竟。事後何容告訴我：「我不便不出席，會中第一案就派我作主委，我不願意，但推不掉，就說：『今後請王華林司長刻何容一個名章，隨你怎樣辦。』討論議案多起，我都沒發言。」我深知他的習慣，常容忍不贊成的人和事，卻不明說，也不爭執，這也算是他的憨厚或鄉愿之處。

記得六十五年國語日報常務董事會例會，洪炎秋社長大發牢騷，列舉台灣各大報，都以發行人及社長刊於報端，「只國語報另列董事長，而且董事長掌權……」。然後拿出一封信，說社長有車，發行人沒有，函請董事長准購一車代步，但回信說：「軍隊中只有營長有馬！」至此他怒極了，拂袖而退席。何容一聲不響會後告訴我：「夏承楹社長的車是他自己買的，發行人要買可以讓報社辦，何必問我？」我勸他：「如不可行，就與他當面解說；若認為報社負責人確需要車，社中有此財力，就告訴他照買就是，何必寫那繞脖子的信呢？」他說：「已經寫了，不想解決……要不，你跟我一起去他家商量，或者可以解決。」我說他自民國十二年就和洪在北大同學，又在台灣同事三十多年，花錢給他選立委，關係不同；我認識洪兄在後，在報社我是外人，你應該自己去，而且立刻就去。「聽說他真的去了，回來只說「看見他家有多少補藥，甚為同情。」我問買車的事如何，何容說，已經說「你認為要買你就買。」事後聽說當年仍然沒辦。按說在董事會那一場很夠尷尬的，但他仍然「肉不幾的」

含糊應付。這件小事可以證實他在我家對我內人說的「我們倆誰也不能完全影響誰。」這也算我體會他為人之一特徵。

生平軼事引人懷念

何容自青年時代參加語文工作，多年熱心國語教育，終身未曾放棄，不過晚年似嫌消極，漸多被動，只為執著事業，難免若干拂意之折磨，及人事的磨擦。他多方忍讓，自甘委屈。他能於坎坷中堅守原則，忙碌中不忘寫作，尤其富幽默感，是多人欣賞他的長處。心理學家及藝術評論者分析，幽默多出於悲憫，包括藉自諷而諷世（電影界大笑匠賈波林之作風，人謂其發自內心之隱痛，反應世道與人性。）何容並不善作肢體活動，亦少面目表情，朋友及一般人士僉稱幽默，細按雖有時近於談諧，亦有時近似痴呆，其表現於外之事跡至多，我只記得幾件：①幼年出天花，早年人慣呼為「何麻子」，他偶然聽到也不以為忤，且時常自認麻子真多，甚至內臟都長滿了——我曾表示懷疑，向他「你怎麼曉得？」他卻未答，至今存疑。②三十四年冬我們在重慶川東師範茶座為他與王炬饒行，他如廁失足踏入尿池，子和抱怨他，說「怎麼辦？」他說「換了就是。」面現無可奈何之表情。③三十九年九月初，我到植物園去找王炬，在辦公室遇見何容等多人，說了閑話後，王忽然問：「那天辦事？」我為找他當司儀，告他「九月十號」。何容一看日曆，立刻喊：「好日子，紅字！」大家哄然大笑——原來那天是星期天，所以印紅字。他很快地抓了個

「眼」。④有一天上午到我家談一件事，近午留他便飯，臨時切點瀟菜又炒了一盤雞蛋。何容有感地指出：河北鄉下待客，也多半炒雞蛋，主人讓客時說「這是我們自己下的蛋。」⑤他自己說某次參加一同仁婚禮時，遇一熟識的中年未婚女賀客，他忽然指禮台問：「妳什麼時候來這個？」女客面紅姍姍而去。不久在殯儀館又遇見那女士也去弔喪，她指靈堂問何容「您什麼時候來受禮？」他自承也只好紅著臉不答。⑥在抗戰期於重慶常聽相聲，一直到老年還常稱贊山藥旦和小地梨兒的口才，多次重誦他們逗眼的機鋒，引人發笑，他卻板著面孔。據說善說笑話者要自己不笑，何容有此長處。⑦一次他坐計程車，司機鬧禍撞傷了人，打了官司；法院傳乘客作證，他兩次都因開會和上課未能到庭，法院警告說再不到就要拘提，通知寄到報社，同仁傳聞失驚，紛紛探問究竟，何容宣佈「我沒犯什麼罪，大家放心。」同仁仍很關切，他自言自語：「沒想到引同情這麼容易，」卻自詡暫時騙過了同事，似乎很得意。⑧某次全省演說大賽，在宣佈競賽成績頒獎以前，例有五十分鐘總講評，何容是總裁裁判，我以評判主任作主席，請他評判。他對寫字、作文、朗誦，各類組演說等等，指出優點和缺點以後，臨完他聲明：「不過今天你們講話的內容，我全沒聽見：」台下師生等賽員，連就近調集的學生聽眾近千人，立刻鬧堂大笑，他也楞了。大家笑聲稍歇，我趕快起立宣布：何先生的話還沒講完，只差半句：他現在耳朵聾，講評朗誦演說部分是根據以往大家的優點和通病為基礎，是

抱歉的意思，大家才釋然。⑨他暮年記憶力衰退，有一次我二人去台中開會，照例夜宿教師會館。那天旅客很多，宣告客滿，只好住進經常為廳長或貴賓準備的二樓雙人房，睡到半夜，忽然值夜的管理員跑上樓找我下去，說何先生被人捉住了，找我去解救，我下樓一問，有一間住的四個青年學生說：「半夜闖進一個穿睡衣的人，到我們屋裡找廁所，疑心他是小偷，問他姓名來歷他都不說，只好抓住他請管理員把他送派出所。」值夜的管理員是新來的不甚認識我倆，經說明身分，證明他真是找廁所走錯了門，才解決了糾紛，請他先入樓上的化粧室。他隨即說明不知道樓上有，下樓去找，又摸不到熟識的洗手間，所以搞錯。管理員一面抱歉一面安撫他請安歇。臨走對我加了一句：「幸虧那間屋住的都是男生，否則……」我沒讓他說下去。可是何容卻紅了臉。⑩廿年前我在新竹清華主持大一國文，例有各系合班的機會，兩小時中請何容去講演，他以「成語」為題，舉例及說明很風趣，記得兩則：（一）一般人隨便改「成語」，如「謹慎」改為「懂慎」，倒不大要緊，把「姑息養奸」的「息」字也加了「女」偏旁，寫成「姑媳」都有奸夫，污辱人家兩代的清白。（二）有的成語可以顛倒，如「紅男綠女」寫作「綠女紅男」，「每下愈況」寫作「每況愈下」都不背原意；但有的不可改，如「三令五申」不可改為「三申五令」；因為先下「令」，以後再「申」催。記得以前老式公廁，都是大家蹲坑的，一個人大便以前，先把草紙放在面前地下，不料一陣風把草紙吹跑了，他後悔：「

早知如此不如先擦。」與「三申五令」一樣。
 ①七十五年三月內人過世，何容與她常共同取笑我，何容曾戲改「閒來無事不從容」的句讀，在「閒來無事」處讀「斷」譏諷我常緊張。為此何容來舍中陪時曾拍案痛惜，也關心喪事及善後。但在松江路救國團開治喪委員會，他許久不到，王子和與柯劍星打電話，聽說何容出來一小

時了。事後大家從永和把他找回來，到家就累倒了。問經過，原來他又忘記地址走錯路，聽起來大家都認為有趣。②有一次張希文約我一齊到報社找何容商量一件事，希文用車接我到報社，到約定時間久候不見，一打電話卻聽說他被蜂螫傷很重。我們去他家探望，方知他看見花架下有很多蜜蜂飛來飛去，他持木棍一探，惹得幾百隻蜂

齊叮，弄得頭面腫得好大，兩眼睜不開。朋友一面痛惜一面笑他像小孩子一樣淘氣。③過後又聽說他在院子花圃旁剪草蹲得太久，累得患了脊椎炎，大概也算是重心發作的老人情態。以後他連年患病，不斷出入醫院，不甚認識人，也不能治事，不但不能與我合作，而且一直到天人永相隔，空留他瀟灑幽默的印象了。八十二年七月五日



① 民國十五年在武昌時的何容。

② 何容（左）與毛子水教授（右）合影。

